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第三十七期 2004 年 12 月  
The NCCU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7, December, 2004

## 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

何明修

### 摘要

在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中，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經常被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與衰退。本文是以文獻評述的方式探討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回顧理論的形成過程，第二，回應當前諸多批判的意見。關於第一點，本文回顧政治機會結構概念如何從不同的研究領域中逐漸匯流而成。其次，在九〇年代以來，由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濫用，許多批評的聲音出現。針對這一點，筆者提出下列的建議：1、更小心地劃分其適用範圍；2、政治機會的研究應重視國家中心論的預設，以分辨資源與機會之差異；3、開放性與封閉性是相對說法，影響社會運動發展的機會存在多種的變遷方向；4、放棄決定論的立場，改採互動論的觀點，並且更注重短期事件、機會製造與中層因果機制的分析。

關鍵詞：政治機會結構、社會運動、資源動員論、國家

---

\* 本文寫作受到國科會計劃(NSC92-2413-H-343-002-FG)支助。草稿曾發表於台灣社會學會年會，2003年11月29-30日，台北：政治大學。我非常感謝在會場上的王甫昌教授評論意見。匿名評審的指教、助理陳麗如與蔡佳德的校正一併致謝。

#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

Ming-Sho, Ho

## Abstract

Recently,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r the degree of openness of political system for collective actor, is a key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 This paper tak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is concept by first reviewing the diverse research trends leading to the discovery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and secondly, meeting contemporary criticism by clarifying some misunderstandings. For the former goa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arl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ring into picture how different research areas facilitated the discovery of politics in social movement. Regarding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challen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researchers should delimit its application range in advance and specify the dimens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explained by this concept. Second, the statist assumption is central in defin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helps to distinguish resource and opportunity. Thir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is a relative term to describe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Social movement is suggestible to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s. Last, research on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should avoid determinist stand and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in stead. Short-term events, making opportunity, and middle level of causal mechanism should be re-integrated in to the research agenda.

**Keyword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social movem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state.

## 壹、前言：政治的重新發現

在一本 1994 年出版的集體行動教科書中，Marx and McAdam 提到：

「幾乎近二十年來的研究作品都基於這種未明言的圖像：社會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形式，由那些缺乏必要影響力的群體所發動，他們無法透過『適當的政治管道』（proper political channels）追求其目標。」（Marx and McAdam 1994: 83）

在五、六〇年代，社會心理學取向的研究是佔主導的地位，強調集體行動是來自於各種異常心理狀態，例如不滿、疏離感、挫折、緊張、認知不協調、相對剝奪感等。從這種觀點來看，社會運動並不是一種「政治現象」，或者說，它本身並不是涉及了權力與資源的重新分配，而只不過是個體情緒的集體抒發。相對於此，晚近研究者強調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的關連性，反對將社會運動化約成爲個體心理現象。採取這樣的政治解讀，社會運動的圖像也是有所不同：在起源上，社會運動是來自於既有權力關係的不對稱，迫使某些被邊緣化群體採取體制外的抗爭活動。在過程上，社會運動是持續與制度化的權力擁有者進行互動，透過施壓、討價還價、聯盟、對抗等形式，爭取群體的利益。就結果而言，社會運動是否能實現其目標是受制於一連串政治條件的組合，並不一定只是涉及了社運團體本身的實力。在這一類的研究作品中，一個經常使用的概念即是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亦即是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與其對於集體行動者所帶來的限制與助益。因此，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經常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起源、過程與結果。

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最早是在七〇年代浮現，逐漸在八〇、九〇年代進入社會運動研究的核心議題。從邊陲到主流的演變過程中，若干意想不到的狀況卻產生了。首先，社會運動即是政治現象的觀點成爲普遍的預設前提，這樣一來，反而是使得什麼是「政治」之問題缺乏討論。舉例而言，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個人的即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與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所提出的「新政治」，到底能否納入政治機會結構中討論？這些概念性的問題容易被壓抑、忽略，造成後續分析上的困難。

其次，由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廣泛使用，卻也造成另一種的結果，

刪除: 的

彷彿任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外部因素都可以被放在這個概念之中。模糊的邊界、不確定的內容成份使得政治機會結構似乎成爲了解釋一切的萬能鑰匙，反而稀釋了其分析上的效用。關於這一點，紐約大學的 Jeff Goodwin 與 James M. Jasper 在 1999 年份的《社會學論壇》（*Sociological Forum*）中提出了批判，他們指出政治機會結構爲核心的研究已經儼然成爲「霸權典範」，然而政治機會結構的基本概念卻面臨了定義上的兩難。如果採取嚴格列舉式的定義，那麼將排除許多可能產生作用的政治因素；如果採用寬鬆的觀點，那麼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將會是瑣碎的，甚至是同義反覆（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0）。Goodwin 與 Jasper 的尖銳批評引起了熱烈的討論，Tilly、Polletta、Tarrow、Meyer、Koopsman 等研究者紛紛回應，形成一個分析典範之間的爭論。

刪除:

最後，也是由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流行，其他理論取向的學者也開始使用這個分析工具，並且賦與不同面向的意涵。文化取向的研究者強調政治機會並不只是制度的面向，仍有文化的面向，因此社運團體的「自我命名」（self-naming）被視爲一種「製造機會」（Jenson 1995: 115），而良好的媒體關係亦是政治機會的一種（Gamson and Meyer 1996: 287）。同樣地，女性主義研究者也指出，政治過程並不是性別中立的，因此需要特別指出某些具有性別意涵的（gendered）政治機會結構（Ferree and Roth 1998: 634; McCammon et al. 2001: 53-5）。到底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是否能夠如此擴充，而保持相當程度的分析效用？這仍舊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釐清這些關於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性問題，並且提出一套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架構。本文主要分爲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探討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形成過程，主要是介紹這種觀點如何從不同研究領域中形成與匯流。此外，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與資源動員論的關係到底爲何，也是要探討的焦點之一。第二部分則是要釐清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內容，適用範圍、方法論、理論位階等相當的議題。本文的基本立場是支持這種取向的分析途徑，然而不可否認地，政治機會結構的理論進一步發展必須要成功地回應許多質疑者所提出來的問題。

## 貳、政治體制的有選擇性開放

政治機會結構一詞是來自於 Peter Eisinger (1973) 一篇探討美國都市

種族抗議的文章。對於種族群體而言，不同的都市形成了相異的政治環境，影響他們實現其利益的可能性。Eisinger 將一般通稱的政治環境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他進一步發現所謂的「抗議的悖論」(paradox of protest)，種族抗議的出現是與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形成一種曲線的關係。換言之，在極端開放與極端封閉的條件下，抗議是不容易產生的，相對地，最容易形成種族抗議的都市往往是具有開放性與封閉性元素的混合。針對這個發現，Eisinger 是如此解釋：開放性即是都市政體的回應性，如果政治機會結構是理論上的完全開放，就沒有必要採取抗議手段來實現其目標，任何新興議題都會很快地被吸收，進入體制內的管道；反之，如果政治機會結構是處於絕對的封閉狀態，抗議則沒有產生的可能性，因為任何集體行動都無法改變統治者的決定 (Eisinger 1973: 12)。

刪除: 諄

對於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而言，Eisinger (1971, 1973, 1974) 的貢獻有兩點：一方面他首先界定了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另一方面，他將政治體制的問題帶進集體研究的討論，並且明確地指出，抗議只有在特定政治脈絡之中才會產生。從這個觀點來看，抗議其實是一種政治行動，是以一種體制外的方式來競逐體制內的權力分配。就這一點而言，同樣是研究民權運動的 Wilson (1961) 與 Lipsky (1968)，提出較為明確的概念分析。首先，Wilson 與 Lipsky 都指出，抗議活動往往是來自於「弱勢者」(the powerless)，他們缺乏體制內的資源，無法以正常方式來爭取他們的利益。因此，抗議即是弱勢者所運用的政治資源，也就是沒有政治影響力情況下所創造出來的政治影響力<sup>1</sup>。其次，抗議其實是一種議價 (bargaining) 的過程，挑戰者所爭取的回報是來自於被挑戰者的讓步。抗議不是全然的道

刪除: 有

<sup>1</sup> Eisinger (1974: 601-4) 反對抗議與弱勢狀態 (the powerlessness) 連結在一起。他強調抗議並不是「異常的」(extraordinary)，而是政治體制中常見的行動類型。根據調查研究，他指出，(1) 美國黑人通常支持民權運動、(2) 黑人抗議參與者比黑人非參與者的社經地位較高、(3) 黑人抗議參與者比黑人非參與者更有社區連結，來證明抗議其實是「常態的」(normal)、「不可或缺的」(integral)。Eisinger 認為他的發現是可以駁斥 Wilson 與 Lipsky 的說法，因為抗議並不必然與弱勢狀態有關係。在筆者看來，Eisinger 在此的論證有若干混淆。第一，Eisinger 其實要論證的是抗議的理性基礎，就這一點而言，Wilson 與 Lipsky 並不會反對。在當時資源動員論仍只是起步的階段，Eisinger 以更早的集體行為理論觀點來看 Wilson 與 Lipsky，使得他誤認所謂的弱勢狀態即是社會心理學家所謂的失序狀態。第二，Eisinger 的意圖之一是要證明，完全的弱勢狀態是無法產生抗議行動。就這一點，Lipsky (1968: 1144n) 也有說明。後者指出，極度的缺乏資源其實是不可能產生集體行動，因此，定義弱勢狀態時是採取相對的觀點，而不是絕對的標準。總而言之，除了 Eisinger (1974) 這一篇文章的混淆以外，筆者並沒有發現 Wilson, Lipsky, Eisinger 等人之間根本性的矛盾。

刪除: 因此，

德說服，也不可能是武力強制，所以被挑戰者的回應總是計算得失的結果（Wilson 1961: 291, 294）。最後，抗議作為新創造的政治資源其實涉及了各種誘因（inducement）。對於抗議對象，挑戰者通常使用負面誘因，使前者感受到不讓步所要承受的損失（Wilson 1961: 292）；對於旁觀公眾，挑戰者使用正面誘因，促使他們關切這個議題，甚至是直接介入衝突，達成向被挑戰者間接施壓的作用（Lipsky 1968: 1145）。

無論是「抗議的悖論」或「抗議作為弱勢者資源」，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預設，即政治體制並不是隨時都保持一致性的開放程度。對於某些群體而言，既有的遊戲規則排除了他們利益實現的可能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才要採取非傳統的行動，來爭取其福利。無疑地，都市政治學者的發現是回應了當時對於多元主義模型的批判風潮。自從六〇年代以降，學者開始質疑多元主義所描述的美國政治圖像，他們強調任何政治組織都涉及了「偏差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使得若干利益喪失了被代表、被討論的空間（Schattschneider 1960）。在既有的體制下，權力的運作不只是取得決策的參與機會，更重要地在於能夠成功將「非決策」（non-decision）制度化，從而排除了對手的參與（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在此，對於後續的研究而言，批判多元主義的預設是重要的。因為如果多元主義的描述是正確的，任何社會群體都分享一定程度的政治權力，他們必然有辦法透過體制內參與、協商與妥協，以獲得某些利益。在沒有任何群體壟斷權力核心的前提下，採取抗議的決定就顯然是不理性的，不是反映了意識型態的堅持，就是只為了抒發心理緊張。因此，在六〇年代以前的美國學界存在一種未明言的學術分工：體制內的政治行為是屬於政治學研究，適用利益政治的模型；體制外的政治行為屬於社會學研究，適用心理學的模型（Gamson 1975: 5-12; McAdam 1982: 17-18）。簡單地說，在多元主義的問題框架之中，政治機會總是存在的，社會利益並不需要以抗議的方式來呈現。因此，一旦政治體制被證明是有選擇性的開放，或者說是排除了「弱勢者」的參與空間，那麼關於抗議的政治條件就成爲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透過 Eisinger, Wilson, Lipsky 等人的理論突破，政治過程成爲了集體行動的研究議題之一。

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將分別探討歷史社會學、資源動員論、新社會運動研究三個不同研究領域，分析研究者如何共同注意到集體行動的政治面向，以及如何共同匯流，最後形成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

刪除: 諄

刪除: 地

刪除: 了

## 參、國家的重新發現：集體行動的歷史條件

在一篇著名的文獻回顧中，Goldstone 指出二十世紀的革命研究經歷了三個世代的演變。第一代的研究者是以描述的方式來探討革命，比較缺乏理論的指引。第二代的研究者主要是運用三種理論，即認知心理學（如 Davies、Gurr）、結構功能論（Johnson、Smelser）、政治學的利益政治（Huntington）<sup>2</sup>。至於七〇年代中期以後的第三代研究者（Eisenstadt、Skocpol、Trimberger、Paige），Goldstone 稱他們為結構取向的，一方面更重視個案的歷史分析，另一方面也強調整體觀點的重要性。Goldstone 指出，第三代研究者的一個共同特性在於重視國家的目標與結構。以往研究者傾向於將國家視為不同利益部門的戰場，第三代研究者則是認為國家形式則是會形塑出不同利益衝突的可能性，因此，在若干國家危機中，革命行動是容易產生的（Goldstone 1980: 435）。換言之，Goldstone 指出，一個當時重要的理論發現即是，集體行動的產生是與特定的國家制度息息相關的。

在 Skocpol 的《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中，她批評傳統的研究過於採信革命者的觀點，將革命視為純粹的有意圖行動，而革命危機則是來自於革命者的挑戰。Skocpol 強調，國家並不能被化約不同階級利益的表現，而是要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國家具有自身的利益，因此相對於主導階級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國、俄國、中國革命的發生是具有相似的背景：面臨國際軍事競爭的農業官僚帝國推動由上而下的現代化政策，反而引發了國家部門內部的菁英衝突，只有在這個關鍵時刻，革命者的企圖才發揮了作用，推翻了舊政權（Skocpol 1979: 99）。Skocpol 後來將這種研究取向稱為「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view）（1985: 4-5），或是「政體中心論」（polity-centered view）（1992: 569）。對於集體行動的政治過程研究而言，「國家中心論」或「政體中心論」明確指出，革命只有在特定的政治條件之下才會形成。Skocpol 對於革命志

<sup>2</sup> 在這篇文章中，Goldstone 將 Tilly 歸類於第二代的研究，而不是第三代的研究。Goldstone 的認定是基於兩個理由，(1)Tilly 將革命局勢定義為「雙重主權」（multiple sovereignty），是與政治學者相近，(2)Tilly 是以都市化、工業化等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來看革命的發生，這也是與六〇年代的主流相近（Goldstone 1980: 429）。在此，筆者的看法是，Goldstone 傾向於忽略 Tilly 在七〇年代的研究架構轉變，現代化理論的概念（如都市化、工業化）逐漸由馬克思主義的架構（即無產化與國家建立）所取代（Hunt 1984: 252）。再者，Goldstone 也忽略了 Tilly 對於同屬於第二代研究的認知心理學與結構功能論之批判。因此，筆者認為成熟時期的 Tilly 是比較第三代的研究取向。



願論的嚴厲批判，更是彰顯了客觀條件的重要性。無論革命者如何看待自身的意圖，革命行動只有在國家危機發生之後才是有作用的，而不是之前。

自從七〇年代以來，Tilly 的歷史研究主要涉及兩個核心議題，即西方社會結構的長期變遷與集體行動形式的演進（Tilly 1981: xi, 1990: ix）。在結構長期變遷方面，Tilly 關切的焦點包括了都市化、無產化、市場經濟興起與現代國家的形成。在分析集體行動的歷史演進時，Tilly 則是注意前述的鉅觀變遷如何影響人民從事抗爭政治的方式。在此，本文無法逐一討論 Tilly 廣泛的學術興趣，只能針對政治結構變遷與集體行動之關連性進行介紹。

對於 Tilly 而言，現代國家的形成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現代國家預設了政治權力的集中化，逐步削減地方諸侯、城市自治權與農村自足經濟。國家的建構者爲了因應國際局勢，需要維持國內的治安，並且從國內人民身上汲取資源，以建立軍事力量（Tilly 1975a, 1985）。Tilly 指出，權力集中化的過程以下列的不同方式影響了集體行動的形式。首先，爲了提高政府稅收，君王與資本家聯手推動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過去區域性的交易障礙。城市的行會經濟與農村的自給自足都受到無情的打壓。因此，Tilly 指出糧食暴動（food riot）即是歐洲現代化過程中最常見的抗爭形式，亦即是地方人民共同對抗中央權力入侵（Tilly 1975b）。其次，根據中央權威的建立過程，Tilly 提出了競爭性（competitive）、回應性（reactive）、積極性（proactive）三種抗爭形式的長期演變。在政府權力未深入地方社會之前，常見的社會衝突是涉及不同區域之間的利益衝突，形成競爭性抗爭。在第二個階段中，政府權力的入侵受到地方人民的反對，形成回應性抗爭。到了最後，民族國家的格局確定形成，人民才轉向政府要求新權利的制定與保護，積極性抗爭才出現（Tilly et al. 1975: 260-2; Tilly 1978: 143-9）。第三，隨著現代國家的成功建立，人民抗爭對象也開始轉向中央政府，並且是訴諸於某種普遍性的意識型態，Tilly 將這種發展趨勢稱之爲抗爭的「全國化」（nationalization），也正是在這個脈絡之下，當代社會運動才與以前的種種抗爭形成強烈的對比（Tilly 1984, 1997）。最後，也是由於這種全國化趨勢，抗爭的表現形式也由「局部的」（parochial）、「特殊的」（particular）、「分裂的」（bifurcated）轉變爲「普遍的」（cosmopolitan）、「模組的」（modular）、「自主的」（autonomous）（Tilly 1998: 12-3）。

除了長期歷史趨勢的討論，Tilly 更進一步提出一套「政體模型」（polity



model) 的分析架構，並且將集體行動定位於挑戰者與政府的持續互動。在既定的政治格局下，若干的「政體成員」(polity member) 享有「對於政府控制資源之例行的與低成本的進路」，相對地，挑戰者必得使用集體行動方式才能佔用這些官方資源 (Tilly 1978: 52)。Tilly 進一步指出，對於挑戰者而言，各種政治條件有可能分別形成機會或威脅 (或說是負面的機會)，影響其實現抗爭宣稱的可能性。政府本身經常是機會的來源，至少有三種回應挑戰的可能性：(1) 採取鎮壓 (repression)，即提高參與抗爭的成本；(2) 協助 (facilitation)，即降低參與抗爭的成本；(3) 容忍 (tolerance)，即不採取鎮壓或協助的行動。Tilly 強調，政府的鎮壓與協助通常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針對不同抗爭議題，或是針對同一件抗爭案的不同面。無論如何，協助通常會帶來機會的提升，從而使得集體行動更容易發生 (*ibid.*: 100-35)。

簡而言之，無論是 Skocpol 的政體中心論或是 Tilly 的政體模型，都是將國家結構重新帶入集體行動的分析之中。Skocpol 指出了在何種政治條件下，革命行動才會獲得成功。Tilly 一方面則是指出政治結構變遷對於集體行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將挑戰者與機會的問題整合進入一更廣泛的分析圖示之中。如果說 Lipsky, Wilson, Eisinger 是處理地方政府與種族抗爭的關係，基本上是屬於都市政治學的領域，那麼 Skocpol 與 Tilly 的研究則是經常被認為是所謂的歷史社會學。很顯然，這兩個不同的學術領域產生了共同的匯流，新的研究取向即是重視集體行動與政治體制之間的互動。

## 肆、從資源到機會：資源動員論的演進

七〇年代興起的研究典範是資源動員論，強調集體行動是源自於理性的利益追求，是透過資源匯集與組織運作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在理論立場上，資源動員論與政治機會結構理論一樣反對社會心理學的解釋，認為集體行動的本質是政治的與理性的，而不能被化約為心理狀態的表現。然而，正是由於這些主張的相似性，使得許多研究者根本上認定兩種理論是同一套說法。舉例而言，Tilly 經常被認為是資源動員論的一份子，原因在於在《從動員到革命》一書中，他不只是提出了政體模型，也另外提出了一套關於利益、組織的動員模型 (Tilly 1978: 56)。同樣地，Wilson 與 Lipsky 也由於將抗議視為弱勢者的資源，也一併被視為是資源動員論的先驅。這種現象反映了資源動員論的成功，它已經不只是一種研究取

向，而是社會運動研究的共同預設，而且可以不斷地吸收其他理論途徑的觀點（Zald 1991: 353）。對於本文所關切的議題，筆者認為有必要探討資源動員論與政治機會結構的關係，以釐清資源與機會的概念差異。

根據 McCarthy 與 Zald 的說法，資源動員論反對採取傳統的「民心論」（“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pproach），將社會運動限定為由基層的人民所發起。民心論的分析方法是探討為何人民會產生不滿，再從不滿來解釋集體行動的出現（McCarthy and Zald 1987a: 338-40）。相對地，McCarthy 與 Zald 認為美國六〇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經歷了專業化的轉向，社會運動不再是草根群眾所發起與主導，而是由專業改革者所領導。資源動員論探討的起點並不是人民的不滿，事實上，不滿總是無所不在的，但是並沒有因此而直接導致集體行動。如此一來，分析的重點並不是在於是否想要改變現狀，而是是否有能力改變現狀。McCarthy 與 Zald 強調，不滿其實是可以由議題企業家（issue entrepreneurs）所定義的，因此，資源的匯入才導致了不滿，而不是相反（McCarthy and Zald 1987b: 18）。

McCarthy 與 Zald 相信，晚近社會變遷提高了流往社會運動部門的資源，造成社會運動的興盛發展。這些變遷趨勢包括：(1)社會富裕化，使得總體的可支配資源（discretionary resources）增加，其中有一部份收入是流向社會運動部門，而不只是為了純粹的個人物質滿足（*ibid.*: 27-8）；(2)高等教育擴張與專業人士的成長，這兩種趨勢都是使得一部分人口具有高度彈性化工作時間表，可以將更多的時間投入社會運動的參與（McCarthy and Zald 1987a: 355-57）；(3)專業改革者的出現，公部門的政府機關或私人的基金會提供越來越多知識份子就業的機會，他們很有可能將自己所掌握的資源投入社會運動，成為所謂的「職業利他者」（occupational altruist）（Zald and McCarthy 1975: 358）；(4)政府福利計劃的投入，隨著公部門社會福利經費的成長，社運組織越有可能以社會工作的名義取得這些資源，並且用來從事動員活動（McCarthy and Zald 1987a: 360-1）；(5)新傳播技術的出現，社運團體開始依賴電視廣告、郵寄廣告等傳播科技，向分散的支持者宣傳理念並且爭取支持，避免了缺乏緊密的動員基礎結構所帶來的動員困境（McCarthy 1987: 59-61）。

從這些論證可知，資源動員論對於社會運動的持續發展是抱持樂觀的態度，其原因在於能夠被潛在動員的資源是呈現成長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資源增加趨勢中，並不一定是與政治體制有關。即使(3)、

(4)是涉及了國家行動的改變，但是在 McCarthy 與 Zald 的解讀之下，這是代表一種長期趨勢，而不是週期性的變化。就這一點而言，早期資源動員論並沒有預設 Skocpol 的政體中心論或 Tilly 的政體模型，也沒有剖析政府對於社會訴求的有選擇性回應，國家沒有被視為一個影響社會衝突的權力核心，這是與後來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是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事實上，資源動員論的基本預設在很多面向上反映了美式民主的習慣，政治權力是比較接近分散的。美國的政黨是低度組織化的，利益中介與匯集的功能較為薄弱，社運組織的動員經常是越過政治中介機制，直接向國會或行政部門施壓。簡而言之，政治面向的探討在傳統的資源動員論中是被壓抑的 (Meyer 1990: 7, 1993: 162-3; Mayer 1991: 50-8)。也由於這個原因，美國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者對於資源動員論大致上採取質疑的態度，他們更拒絕使用這個名稱來描述自己的理論立場 (McAdam 1982:20-35; Jenkins and Eckert 1986; Piven and Cloward 1992)。

另一方面，Perrow (1979) 有個值得參考的說法。他區分出兩種「資源動員論」，其中「第一種資源動員論」(RM1) 包括 Oberschall、Tilly、Gamson 等人，而「第二種資源動員論」(RM2) 則包括 McCarthy 與 Zald。RM1 將抗議視為「以『非常態』的方式進行常態政治」，社會運動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格，換言之，抗爭即是以其他方式來從事政治 (politics by other means)。相對地，RM2 則是較為狹義，特指 McCarthy 與 Zald 所提出來的社會運動專業化理論，而且是專門指涉美國六〇年代的局勢，亦即，社會運動越來越是由外來的專業知識份子所領導 (Perrow 1979: 199-202)。事實上，如果放在後來的理論發展脈絡來看，Perrow 所謂的 RM1 即是後來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而 RM2 即是早期的資源動員論。在早期，兩種觀點都共同挑戰集體行為理論的心理預設，並且都重視理性的行動基礎，因此，Perrow 都是以「資源動員論」來稱呼這兩種途徑。

事實上，McAdam (1996: 26) 指出，早期政治機會結構的學者爲了要使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普及化，他們經常將機會視爲另一種社會運動的資源，以配合主流資源動員論的觀點。<sup>3</sup>不幸地，這種權宜之計留下來若干概念不清之處，使得後來反對政治機會結構分析的學者更是振振有詞。

**刪除:** 他們經常將機會視爲另一種社會運動的資源，以配合主流資源動員論的觀點。

<sup>3</sup> 同樣的理論發展與概念精緻化也可以在台灣的社會運動研究中發現。張茂桂(1989)是探討八〇年代社會抗議風潮的先驅性經典作品。其中，張茂桂大致上採取了資源動員論的觀點與術語，來解釋政治轉化如何爲集體行動製造機會 (*ibid.*: 89-109)。到了九〇年代，張茂桂(1994: 45-49)則是進一步剖析資源動員論與政治機會的關係。

根據資源動員論的說法，資源是泛指各種有利於運動動員的各種條件。早期資源動員論的學者似乎將資源的概念視為既定的，不需要進一步解釋。舉例而言，在 McCarthy 與 Zald 在 1977 年提出的文章中，他們提到資源匯集的重要性，但是卻只是將貨幣與勞力兩項因素放入括號中（McCarthy and Zald 1987b: 18），沒有更多的說明。Freeman（1979: 174-175）則是提供更細膩的分類，將資源分為有形的、專業的、地位的與非特定的。儘管如此，正如有些批評者所指出，資源動員論甚至連最基本的概念（即資源）都沒有嚴格定義，在實際的研究作品中，資源經常泛指一切有助於運動動員的東西（McAdam 1982: 32; Kitschelt 1991: 336; 何明修 2003b: 22-23）。在這種情況下，早期政治機會結構研究者將機會理解成爲一種資源也將不足爲奇了。

刪除: 沒

在此，爲了使得資源概念有更準確的判準，也爲了區分資源與機會，筆者認爲可以援用「國家—社會」的架構進一步釐清這兩個概念。無論是人力、財力、知名度、組織網絡、空間、理念、社會關係等因素，資源的概念都是指涉來自於社會層次的條件，是透過結社原則而創造出來的。相對地，政治機會的定義則是以政體爲中心，亦即是涉及了當前國家權力的實施與不實施。要發動社會運動，社運組織需要匯集資源，無論是從外部爭取或是由當事者自行貢獻。相對地，沒有社運組織能夠將政治機會佔爲已有，雖然他們在某種程度之內可以試圖改變不利的政治機會結構。另一方面，在若干情況下，資源與機會是相互影響的。擁有某些資源即是開啓了若干政治機會，例如有專家學者參與的社運組織，較能夠有可能與官員直接溝通。儘管如此，資源與機會仍是分析上明顯有別的概念，因爲擁有專家學者的資源仍有可能導致其他動員效果，例如較容易獲得公信力與媒體報導，而這些作用並不是來自於與官員直接溝通的政治機會。

在 Piven and Cloward（1977）與 McAdam（1982）等的重要作品中，資源與機會的區分是顯而易見的。Piven and Cloward（1977）認爲社會運動的特色並不是資源動員論所謂的組織化動員，而是在於群眾抗命（mass defiance），亦即是原先順從體制安排的人民開始反抗，拒絕接受先前的例行化規則。與先前的都市政治學者所強調的抗議作爲資源相類似，群眾抗命的效果表現在於制度擾亂（institutional disruption），造成日常生活秩序的破壞，使得統治菁英不得不回應，以滿足群眾的要求。分析美國歷史上的四種社會運動，Piven and Cloward（1977: 16-7）雖然沒有使用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但是他們卻明確地指出選舉制度是影響社會運動的重要結構變項。民眾不滿常是透過選票轉向表現出來，對於執政菁英而言，

這即是代表了一種警訊，因此迫使政府採取安撫不滿的政策，以回應群眾的期待。對於 Piven and Cloward 而言，資源動員論所強調的專業化組織與領導並不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資源。事實上，他們強調社會抗議最能夠發揮作用的時候，往往是缺乏正式組織的支持。草根人民的自發抗命造成了普遍的不確定性、恐慌促使執政菁英讓步。Piven and Cloward (1977: xx-xxii) 進一步強調，組織化經常使得基層抗議的能量消退，反而使得社會運動更容易被國家所收編。總結來說，Piven and Cloward 批判資源動員論的政治面向討論不足，他們重視草根群眾的抗命，原因在於後者往往是迫使執政菁英採取行動的最佳武器。換言之，集體行動的組織化即使可以稱得上是資源的增加，但是對於政治作用而言，卻沒有太大的助益。

McAdam (1982) 分析美國民權運動的起源，他指出工業化與都市化等社會變遷的過程並不是直接促成抗議的原因，而是由這些結構變遷改變了既有的權力關係，一方面使得挑戰者享有更優勢的議價空間，另一方面則是提高了執政者採取鎮壓的成本。社會運動的出現是反應了政治機會的擴張，使得挑戰者更能夠採取抗議的手段，同樣地，當政治機會開始收縮時，社會運動則是處於衰退狀態。McAdam 將這種政治生活中的權力關係總合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他強調許多足以撼動既有政治生態的因素，例如戰爭、國際政治局勢、失業、人口變遷等都有可能改變既有的政治機會結構，因此，不可能列舉所有影響政治機會結構的因素 (*ibid.*: 41)。在 McAdam 的分析中，1961-1965 年間是民權運動的極盛時期，政治機會結構的擴張表現於：(1) 黑人選票重要性成長，逼使民主黨政府採取支持民權運動的行動；(2) 冷戰所帶來的國際壓力，使得執政者要回應國際社會對於美國種族不平等的批評；(3) 種族成為最顯著的議題，使得民權團體獲得北方自由派白人的支持 (*ibid.*: 156-163)。在 1966-1970 年間，政治機會結構逐漸收縮使得民權運動面臨越來越不利的環境，其中包括了(1) 反動派的動員造成了黑人選票重要性的消失，最後使得保守派尼克森上台；(2) 越戰等其他議題的出現使得種族問題的公共關切下降 (*ibid.*: 192-201)。

McAdam 也批判資源動員論對於外來菁英支持的樂觀期待，他認為運動的資源並不一定要來自於直接當事者以外。他強調民權運動中的自有組織資源 (*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的重要性，黑人教會、黑人大學與民權組織都是在動員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ibid.*: 29-32, 125-42)。McAdam 比較黑人抗議與基金會、慈善團體捐款的時間，他發現菁英的支持總是在抗議動員之後才出現的，其本身並不是促成抗議的主

因 (*ibid.*: 122-4)。

McAdam 對於資源動員論的另一項批判則是在於忽略了民怨 (grievance) 的重要性。傳統的資源動員論拒絕將集體行動視為心理狀態的後果，他們以物質資源的問題來取代內在心理的探討。因此，不滿是被假定為普遍存在的，只有當外在資源匯入時，抗爭才有可能出現。在 McAdam 看來，民怨的出現也涉及了集體定義的過程，一旦政治機會結構開啓了，從屬者也更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並且相信有能力改變現狀。換言之，所謂的「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也是動員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的環節，其本身也是受到政治過程的影響 (*ibid.*: 35)。

刪除: 了

相對於 Piven and Cloward (1977)，McAdam 的理論化企圖心較龐大，正式提出了一套解釋社會運動興起的模型。他將政治機會結構、自有組織資源、認知解放三項要素組成爲所謂的「政治過程論」(political process theory)。在 McAdam 看來，這一套解釋架構可以用來取代「古典模型」(即各種的集體行爲理論)、「資源動員模型」，成爲未來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導向。<sup>4</sup> 根據 McAdam (1982: 40-41) 的說法，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是從 Lipsky、Eisinger 的研究作品而來。很明顯地，至於自有組織資源與認知解放，則是 McAdam 分別由資源動員論與集體行動理論整理與批判加工而來的。因此，政治過程論的名稱雖然是來自於 Tilly，但卻是一個理論上的綜合模型 (*ibid.*: 36)。

刪除: 是

儘管如此，在批評者看來，政治過程論即是一種不變的模式 (invariant model)，妄想處理所有的社會運動個案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29)。實際上，從後來的研究發展來看，McAdam 所指出的三項因素並不是條條，而是在理論上更精緻化的發展與探討。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7: 152-159) 即主張，政治機會、動員結構、構框過程 (framing process) 三個主要分析概念可以互補，共同形成一組研究社會抗爭的整合型典範。同樣地，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1-17) 也有類似的說法。後者認爲政治機會、動員結構、策略性構框 (strategic framing) 可以綜合成爲一種比較社會運動的研究架構。換言之，儘管政治過程論的名稱並沒有普遍使用，但是其理論的基本要素卻獲得進一步的探討與發展。因此，針對本文所要探討的政治機會結構而言，筆者認爲可以單獨將這個要素抽離

<sup>4</sup> 以下的討論要感謝王甫昌教授的建議。

出來，並且進行文獻回顧與分析。

## 伍、新政治的舊政治基礎： 歐洲的新社會運動研究

長期以來，歐洲六〇年代以後的新社會運動（即生態運動、和平運動、女性運動）之研究都是受所謂新社會運動理論的主導。簡單地說，這些研究者宣稱由於先進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新時代的社會運動在政治對抗軸線、文化價值、參與者、動員形式、運動策略都與過去的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呈現相當大的差異（王甫昌 1999：516-7）。然而，許多研究者對於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解讀並不能接受，他們認為，一個合理的理論除了指出新社會運動的「意義」以外，更要能解釋其發展的軌跡（Koopmans 1999: 98）。此外，研究者也質疑，新社會運動過於關切應然的問題，而無法處理經驗層次的分析（Kriesi et al. 1995: 239）。

首先，研究歐洲新運動的學者指出，儘管社運組織表面上宣稱是超越政黨，但是為了發揮其政治影響力，許多社運組織都是與既有的政黨勢力進行聯盟合作（Dalton 1994, 1995; Koopmans 1995; Maguire 1995; Kriesi et al. 1995）。其次，也有研究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並不是脫離舊有的工會或政黨團體，他們其實是來自於一個更廣大的動員網絡之中，具有成員身份的高度重疊性（Rochon 1990; Klandermans 1990）。為了強調新社會運動所具有的創新性格，研究者通常強調這些運動與既有政治體制的疏離，他們拒絕採取既有的政治行動劇碼。誠然，晚近以來的新政治（new politics）越來越是涉及日常生活的議題，抗議的首要對象也不再是政府。然而，正是由於缺乏對於社會運動與國家的分析，新社會運動理論無法處理新舊政治之間的連結，甚至是忽略了其若干共通性。Tarrow 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社會運動理論成爲了一種「大而無當的理論」（Grand Theory），無法處理集體行動研究的核心議題，即如何從既有的社會結構產生集體行動（Tarrow 1989b: 62）。這些批評意見共同指向了一個可以進行研究的方式，亦即是歐洲的新社會運動是在何種的政治條件下產生，又是造成了何種的政治影響。對於這個問題，Kitschelt（1986）與 Tarrow（1989a）的研究最值得重視。

Kitschelt（1986）基本上是一篇十分濃縮但卻富有高度啓發性的期刊論文，他試圖以政治機會結構的差異來分析法國、西德、美國、瑞典的



核能運動。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sup>5</sup>（例如美國與瑞典）促使反核運動採取同化性策略（*assimilative strategy*），儘可能地以體制內管道來表達反對；相對地，在封閉的政治機會結構（例如法國與西德）下，反核運動則是採取對抗性的策略（*confrontational strategy*），在決策管道以外進行抗議活動。基本上，Kitschelt 參與 Eisinger 的觀點，以政治體制的開放性來定義政治機會結構。在實際的操作化層次，Kitschelt 以下列的四個面向來界定政治機會結構，(1)政黨數目，越是多黨制越容易容許新興利益的政治表達；(2)立法機構對於行政機構的獨立性，如果獨立性越高，越容易使得新訴求受到國會的支持；(3)利益中介的模型，多元主義的模型使得異議更容易表達，而統合主義則是傾向於抑制新興議題；(4)要求匯集的管道，如果政治體制容許議題形塑的空間，則越具有開放性。

刪除: 是

Tarrow (1989a) 則是關於義大利六〇、七〇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之研究。Tarrow 研究的最重要貢獻是將政治機會結構與抗議週期的議題連結在一起。在他看來，抗議活動的頻率通常呈現拋物線的分佈，反應了政治機會結構的開啓與再度收縮。在抗議週期上升的階段，抗議行動一開始是缺乏組織的，但是抗議戰術卻不斷創新，運動的詮釋框架也是迅速擴散。到了抗議週期的後段，社運組織已經成形，運動創新的步調開放減慢，不同組織之間面臨強大的競爭壓力。派系傾軋成爲嚴重的問題，邊緣組織的暴力化與溫和訴求的制度化是同時進行的趨勢。Tarrow 認爲所謂的政治機會結構並不是只有單一的面向，而是包含了許多的變項的組合。根據他的整理 (Tarrow 1989a: 22-3, 1989b: 34-6, 1994: 86-9, 1996a: 54-6)，政治機會結構主要以下列四種面向呈現：(1)政治管道的存在，既有的政治局勢越是提供人民參與決定的空間，機會則是越開放；(2)不穩定的政治聯盟，政治局勢越是動盪，越能夠提供挑戰者運作的空間；(3)有影響力的盟友，社會運動需要外來資源的匯入，政治盟友的出現是有助於運動的動員；(4)菁英的分裂，如果執政者無法採取一致的行動來回應外在要求，亦即是爲挑戰者開拓了一道機會之窗。

刪除: 84

<sup>5</sup> 實際上，Kitschelt 認爲，政治機會結構基本上可以區分爲投入與產出的兩個面向，前者是涉及了開放與封閉程度的問題，影響了社會運動的策略取向；而後者則涉及了國家行動力的強弱問題，決定了社會運動的實際影響。Kitschelt 認爲既定的政治條件不只影響運動的過程，更決定了運動的結果。Tarrow (1989b: 82)指出，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最好只包括社會運動可以控制的資源，而避免將國家行動力納入。筆者同樣也認爲要影響社會運動動員的條件以及影響社會運動結果的條件（何明修 2002）。爲了行文方便起見，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只討論 Kitschelt 所謂的政治投入結構。

Kitschelt (1986) 與 Tarrow (1989a) 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前者是共時性的跨區域比較研究，而後者則是實時性的動態研究。歐洲新社會運動的研究都指出了新社會運動理論的不足，而進而探討這些新政治的舊政治基礎。換言之，既使人民抗爭的主題有所改變，但是集體行動仍是一種與政治菁英的策略性互動，並且受制於各式各樣的政治機會所影響。相對於以往的研究，這些研究作品更深入地剖析國家組織的內部成份，與其對於集體行動所造成的影響。<sup>6</sup> 此外，這些研究也是充滿了高度理論化的意圖，試著提出政治機會結構的普遍定義。然而，是否這種定義是有可能的或是有必要的？筆者是持保留的態度，在第六小節，本文會再回到這個問題。

## 陸、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運用與批判

回顧了九〇年代之前的研究作品，在此有必要為政治機會結構提出一個概念性的定義。政治機會結構是指一組以國家組織為中心的變項組合，對於集體行動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可能性，並且提高或降低了運動動員所需要花費的成本。政治機會之所以形成結構，乃是由於在既定的政治脈絡中，這些變項的組合是具有相對上的一致性，並且對於集體行動產生大致上相近似的作用方向。更進一步來說，構成政治機會結構的面向包括了政治管道的存在、菁英體制的穩定性、政治聯盟者的存在、國家鎮壓能力與傾向等。這個定義主要是綜合歸納上述的 Eisinger (1973)、Tilly (1978)、Tarrow (1989a)、Kitschelt (1986)、Piven and Cloward (1977)、McAdam (1982) 而來的。需要強調的，在這些作品中，研究者都沒有提出嚴格的概念性定義。Eisinger (1973) 是用政治機會結構來泛指不同地方政府的開放性差異，或是他所謂的「政治環境」。另一方面，Tarrow (1989a) 與 McAdam (1982) 則是以列舉來代替定義。至少在九〇年代中期之前，學者似乎沒有想要更精緻地處理這個概念。就以 Tarrow 為例，在較早的作品中 (1988, 1989a, 1989b)，他都沒有定義政治機會結構，而直接視這個概念是學界所熟悉的。一直到了九〇年代中期的作品 (1994: 85, 1996a: 54)，才能找到概念定義。<sup>7</sup>

刪除: 1979a

<sup>6</sup> Kriesi et al. (1995: 241-242, 283n) 指出，相對於美國的研究作品，歐洲研究者更重視國家組織，採取更為結構主義的取向。他們也指出，雖然在革命的社會學研究中，Tilly, Skocpol 等人重視國家，但是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這個觀念仍未完全發揮。

<sup>7</sup> 儘管如此，1994 年的定義強調政治機會結構是一種「誘因」(incentive)，而 1996 年的定

這裡的定義有下列的特徵：以國家為中心、將機會視為一種客觀條件、重視社會運動作為一種與執政菁英的策略性互動。到了九〇年代以後，並非所有研究者都能夠接受這種觀點，在實際操作上，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將逐一討論若干政治機會結構的爭議，並且試圖整理出一種可行的研究策略。

刪除：不

### 一、政治機會結構是研究那一種社會運動？

從早期的 Wilson (1961)、Lipsky (1968)、Eisinger (1973) 作品以來，學者傾向以政治關係角度來觀看社會運動。社會運動不同於一般利益政治，並不是因為前者不是理性地追求利益，而是缺乏政治權力，迫使他們要採取體制外的抗議手段。因此，研究者常以「弱勢」(the powerlessness) (Wilson 1961; Lipsky 1968; Jenkins and Perrow 1977)、「挑戰者」(Tilly 1978; Gamson 1975: 14-18) 等概念來界定社會運動的政治位置。Marx and McAdam (1994: 110) 更進一步指出，如果社會群體是以「適當管道」以外的方式來追求利益，就是符合了社會運動的定義。在此，學者顯然有高度的共識，他們對於所研究的社會運動有一種共同圖像：社會運動是起源於既有的體制不公平，並且要求改變現狀的集體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角色是重要的，一方面，國家本身有可能是被抗議的對象，民眾要求改變權力的運作方式；另一方面，國家也有可能被運動者視為是一種槓桿工具，用來改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 (Quadagno 1992)。Jasper (1997: 7) 將這一種以國家為主要抗議對象的社會運動稱為公民權運動 (citizenship movement)，因為它們都是向政府施壓要求權利的擴充，以容納更廣大的社會群體。然而，在此的問題在於，難道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是公民權運動，可以適用於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嗎？

刪除：並

到了九〇年代，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者對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開始出現。從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角度出發，Melucci (1994: 107-109) 批評這一類研究即是政治化約論，因為研究者只側重社會運動與政治、權力、國家的互動關係，而忽略了社會運動對於當代文化意義與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構。Melucci 擔心，這種狹義的政治分析會使得晚近社會運動的特殊性消失，成為利益政治的延長，而文化創新、認同形塑、日常生活的民主化等

義則視其為一種「訊號」(signal)，其中存在顯著的差異。

運動目標都被 (post-citizenship movement) 研究者視而未見。批評者也舉出各式各樣的「後公民權運動」，例如動物權運動、新宗教運動、自助運動，來質疑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效力。他們強調這些運動根本不是想要與國家打交道，政治機會對於這些運動者而言是沒有影響的。更進一步而言，既然研究者是以政治關係來界定社會運動的位置（例如弱勢、挑戰者等），這種分析途徑就是側重某一種的社會運動類型，而不是宣稱某種普遍性的架構（Jasper 1997: 7-9;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4-36）。

事實上，這些批評有許多是受到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啟發，尤其是對於文化的重視。Jasper 指出，後公民權運動並不是爲了要爭奪某種政治資源與權力，主要的參與者都是中產階級，而不是某些被排除的邊緣團體。這一類型的運動並沒有以國家爲導向，所以沒有受到政治機會結構的影響。因此，更簡單地說，文化論者所提的質疑在於：

- (1) 在所有的社會運動現象中，是否存在一種共同目標與性質？
- (2) 所有的社會運動是否都適用於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

關於(1)，從很早以來，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就認爲資源動員論不能解釋所有的現象，他們反對以常態的利益政治模型來套用於各種的社會運動。Touraine (1988: 125) 就曾指出，「社會運動是某種普遍意義與社會圖像的承載者，不能只被局限於抗議、宣稱與改革的狹小世界之內」。因此，對於 Touraine 而言，社會運動不能被簡化爲一般的衝突，前者的特殊性正在於強烈的文化取向。Cohen 與 Arato 有相近的說法。他們強調社會運動採取一種所謂的雙重策略 (dual strategy)，一方面在民間社會內部由溝通行動建立共識，培養進步而批判的認同；另一方面，以集體的力量向國家部門施壓 (Cohen, 1982, 1983, 1985; Cohen and Arato, 1994: 492-563)。Cohen 與 Arato 強調社會運動不只是策略性的資源動員，更是一種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換言之，無論其名稱是新社會運動或後公民權運動，這些研究者都宣稱有另一種的社會運動類型存在，其目標即是改造文化，而不是爲了某種資源或權力。

事實上，就社會運動目標的多樣性這個命題而言，政治機會結構學者也會同意。Rucht (1990: 162-6) 就曾指出，晚近歐美社會運動可以分爲工具性的 (instrumental) 與表達性的 (expressive) 行動邏輯。工具性運動的主要策略是權力取向的 (power-oriented)，關切國家的決策過程，並且試圖進行權力的重新分配。相對地，表達性運動則是採取認同取向

刪除: 是

的 (identity-oriented)，將焦點放在文化符碼、角色行爲、自我實現等生活面向。同樣地，Koopmans (1999: 98) 也承認，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格，所謂的次文化 (subcultural) 運動與反抗文化 (countercultural) 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因此，(1)並不是真正的爭議重點，研究政治機會結構的學者可以欣然接受運動目標的多樣性，而不會妨害他們的理論性宣稱。問題的核心反而是在於(2)，如果政治機會結構只能分析某些特定的社會運動，那麼其理論效力則是十分有限的。

在此，一個解答(2)爭議的方法在於檢討政治機會結構學者如何定義社會運動。根本的問題在於：是否其社會運動的定義過於狹窄，無法處理所有可能的經驗現象？根據 Tarrow (1994: 4) 的定義，「社會運動是由具有共同目的與彼此團結的人民所發動的集體挑戰，持續地與菁英、對手和權威從事互動」。這是一個十分重視社會關係的定義，人民與其對抗者的互動是核心。就這一點而言，即使是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也是涉及了社會關係的重新建構，新認同的形塑過程也是不能自外於社會對抗的格局。越到了後來，學者對於關係的重視更加明顯，他們強調社會運動即是一種互動關係，而不是某種獨立的實體 (Tarrow 1996b: 874; McAdam and Tarrow 2000: 149;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72-74)。

不過，上述的定義並沒有說明清楚政治體制的角色，所謂的「菁英、對手與權威」只是爲了試圖容納所有可能的抗爭對象。越到了晚近，McAdam, Tarrow 與 Tilly 等人試圖提出一套可以包含集體行動、革命、社會運動的「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模型。所謂的抗爭政治即是 1/「關於抗爭，亦即對於他人提出涉及利益的宣稱」，2/「至少互動中的一方(包括第三者)是政府」(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6: 17)。在 2001 年的著作中，關於國家的角色有更進一步的釐清，「政府至少是一個宣稱提出者、宣稱的對象，或是與宣稱有關的一方」(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5)。換言之，政治機會結構並不是只分析挑戰政府政策的社會運動。由於現代國家組織形態的出現，在這種政治權力與資源的高度集中化前提下，社會衝突的軸線總是涉及政府權力的實行與不實行，無論其關係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因此，即使是追求文化解放的社會運動也會受到政治機會結構的影響。舉例而言，研究拉丁美洲生態與女性運動的學者也指出，由於長期以來的威權統治與民主運動潮流，拉美的「新」社會運動仍是具有許多「舊」社會運動的特徵，包括高度政治化的參與、政黨認同與草根群眾基礎 (Mainwaring and Viola 1984; Foweraker 1997)。在

Kriesiet al. (1995:165-169) 的研究中，歐洲的同性戀運動不只是慾望與認同的追求，同時也涉及了一種政治過程。透過對於不同國家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Kriesi 等人可以解釋為何動員的密集程度與策略呈現各國的差異性。同樣地，Perry (2001) 也指出這樣的奇特的現象：當前中國政府盡力疏導愛國主義的抗議，一定程度上寬容工人與農民的集體上訪，但是卻對於最不具有政治色彩的法輪功學員，採取嚴厲打壓的政策。Perry 認為原因在於，特有的政治條件使得共產黨政府無法容忍具有廣大社會基礎的宗教團體 (*ibid.*: 171)。法輪功的故事也啓示這一點，即使是最個人、心靈取向的新宗教運動也面臨了既有的政治機會結構限制。

刪除：所

針對(2)的問題，本文認為，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重視互動關係與國家的角色，因此可以提出一套具普遍性的參考架構。反對者經常指出，政治機會結構學者多半研究政治味較重的社會運動，因此這套理論是為了這一類型的社會運動量身設計，是有選擇上的偏見 (Jasper 1997: 35; Jasper and Goodwin 1999: 35)。然而，這並不能代表所謂的後公民權運動不能進行政治過程的研究，相反地，這個未開發的領域反而是政治機會結構研究下一步發展的契機。總之，如果能夠妥善運用，這個概念將能夠發揮十分有用的分析效力，尤其是針對於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的互動面向。

## 二、國家中心論與政治機會結構的核心成份

前面提到，政治機會結構的發現是與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息息相關，事實上從一開始，這個研究途徑所構想的政治即是狹義性的指涉，只涉及了制度化的政治部門，亦即國家組織。一直到九〇年代之前，無論是在 Lipsky, Eisinger, Wilson 的都市抗議研究、Tilly 的歐洲抗爭史研究、Skocpol 的革命研究、McAdam, Piven and Cloward 的美國民權運動研究、Kischelt, Tarrow 的歐洲新社會運動研究，都是遵循這個未明言的設定。但是一直到了一篇 1996 年的文章中，Tarrow (1996a: 45) 才正式稱這種觀點為國家中心論的 (statist)，並且視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為其理論先驅。<sup>8</sup>

然而，誠如 Connolly (1983) 所指出，許多政治學的基本概念都是本質上充滿爭議的 (essentially contested)，學者始終無法賦與這些概念一個共同的意義內涵。因此，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政治機會結構的國家中心論是否為一種合理的預設？對於這個問題，與其要處理什麼是政治的本質意義，不如探討以國家為核心的分析途徑到底能夠提供我們什麼樣幫助？從長期的歷史觀點來看，Tilly 指出現代國家建構本身即是一個充滿衝突的過程，而在其形成之後，更進一步形塑了抗爭政治的可能性。在政治的全國化 (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的趨勢下，國家即是一國之內政治資源分配的中心點，不同群體的抗爭政治總是涉及了國家權力的分配問題。在此，筆者贊成國家中心論分析取向，其理由是方法論的，而不是涉及了政治的實質定義。筆者認為執政者與反對者的持續互動仍是社會運動研究中重要的一環，需要一種獨立的分析架構來處理。

進一步來說，這種國家中心論的分析至少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政治機會與運動資源的概念差異。誠如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2-33) 所指出的，在晚近許多使用政治機會結構的作品中，這個概念已經是十分浮濫的使用。分析其原因，主要的問題是在於忽略國家中心論的根本預設，許多應該歸類為運動資源的東西被稱為政治機會。舉例而言，在一篇研究中美洲的農民運動的作品中，研究者將農民的「民怨」也視為政治機會之一

---

<sup>8</sup> 在此，Tarrow (1994: 85) 為了強調政治機會結構與國家的關係，將這個概念描述為「外在的資源」。儘管如此，這種描述仍是容易造成機會與資源的混淆。



(Brockett 1991: 335)。十分類似地，Kriesi et al. (1995: 3-25) 也將國內政治勢力的分歧結構 (cleavage structure) 視為政治機會結構的變項之一。這些例子都是混淆了機會與資源的概念，使得政治機會的概念顯得過於鬆散，甚至不再具有分析效力。

刪除: 都是

有些研究者則是意圖擴大政治機會結構的指涉範圍，他們認為國家中心論是一種結構主義偏見，無法分析社會運動所實際面臨的過程。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Gamson and Meyer (1996: 279-283; 287-288) 進一步指出政治機會不只有制度的面向，仍有文化的面向。因此，他們將社運組織的媒體進路 (media access) 也視為一種政治機會。研究智利婦女運動的作品指出，政治機會結構應該納容非正式領域中的權力分佈，因為婦女的抗爭經常是在此展現 (Noonan 1995: 83)。此外，在另一類研究作品中，研究者表面上接受國家中心論的定義，但是在實質的操作上，卻夾帶了一些與國家組織無關的測量面向。例如，在一篇研究美國婦女參選權運動的作品中，研究者將女大學生比例、女律師與女醫師比例、婦女組織數目等變項視為性別政治機會結構的面向之一 (McCammon et al. 2001: 53-4)。<sup>9</sup> 也有研究者認為高等教育培養寬容的態度，因此，對於保護同性戀的反歧視立法而言，大學院校的存在也構成了政治機會結構的要素之一 (Wald et al. 1996: 1160)。

在此，筆者雖然同意文化與性別關係對於社會運動的重要性，但是這種擴充將會使得這個概念過度負擔 (overloaded)，變得無法進一步處理。再者，如果這些研究者的企圖是合理的，那麼所有過去被視為運動資源的元素全部都可以重新以機會的名義出現。因此，社運組織所具有的財力支援可以被視為「財力機會」，所能動員的參與者亦可以視為「動員機會」等等。如此一來，除了增添分析上的困難度以外，等於是什麼都沒有說。就上述的例子而言，女性專業者與大學數目應該是屬於資源的範疇，因為這些要素的存在與否並不是直接與國家部門有關。因此，堅持國家中心論的立場並不是要排斥其他因素的意義，將政治機會結構限定於國家部

刪除: 如果

刪除: 且

<sup>9</sup> McCammon et al.(2001)提所謂的「性別(gendered)政治機會結構」與「沒有性別差異(ungendered)政治機會結構」之分別，以掌握婦女運動所面臨的特殊政治環境。先不論他們所提出的來政治機會結構內容是否恰當，筆者仍懷疑這種理論化策略誤導的作用恐怕會比實際分析效用更大。即使處於相同的時空脈絡，相異的社運組織就是處於不同的政治機會結構，因此似乎沒有必要去區分什麼是涉及性別關係的，而什麼又不是。除非研究者是要比較不同社會運動所面臨的環境差異，否則筆者認為沒有必要去強調這種差異。

刪除: 了

門之內，能夠提供研究方法上的聚焦作用，避免了更多的概念混淆。

其次，國家中心論的政治機會結構觀也有助於釐清新政治與舊政治的差異。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發現了晚近進步政治的結構變遷，越來越多的社會運動是要求日常生活的民主化，而不是爭取某種政治資源。然而，到底是否存在某種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新社會運動，需要另一種的分析方法，則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對於許多人而言，新舊社會運動的差別可以表述為認同／權力、文化／政治、承認／重分配等對立。但是這種簡化說法不容易站得住腳，誠如 Calhoun（1993）所指出的，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一樣涉及了認同形塑與文化建構的過程，因此，承認政治並不是晚近的新發現。

刪除：著

本文認為，新政治的確帶來了不同與以往的議題與參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擴充了社會運動的範圍。儘管如此，這一類的新興社會運動或多或少仍是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因此能夠進行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在此，可以採用 Giddens 對於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探討，來理解這些新興社會運動。在 Giddens（1991: 209-217）看來，晚期現代性導致了傳統與自然的消失，自我利益成爲是有問題的，需要透過行動者時時刻刻加以定義。生活政治提出了倫理學的問題，亦即是我們要如何選擇自己的生活，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面向都可以被反思與批判。相對地，傳統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關切的正義、平等和參與的問題，因此可以落在具體的法律與政治制度。簡單地說，生活政治關切生活風格（*life style*）的選擇，而解放政治則是涉及生命機會（*life chance*）的分配。Giddens 的提法承認新政治的創新性格，同時避免了過度簡化的二元論。更重要的，他認為生活政治與解放政治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抉擇，兩者之間其實可以透過若干形式進行接軌。Giddens 強調，儘管生活政治在當代重要性十分顯著，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解放政治的消失。一方面解放政治提供自由的政治環境，使得生活政治的議題可以公開討論，另一方面，生活政治也是涉及了公民權的制度化，而不只是純粹的文化事件（*ibid.*: 226）。因此，就這個共通性而言，有關性傾向、生物科技、環境倫理等議題社會運動也是某種的政治過程，可以用政治機會結構加以分析。更重要的，正是由於生命政治具有公共政策與公民權的意涵，因此國家中心論的基本預設仍是有效的。

刪除：日

刪除：攸

另一方面，既然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常有濫用的危機，一個可能的作法即是事先詳述其主要的內容，以杜絕過度擴張的危險。上述的

Kitschelt (1986) 與 Tarrow (1989a, 1989b, 1994, 1996a) 即是採取這種策略。McAdam (1982) 在早期作品中，並沒有明確提出政治機會結構的內含，但是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的作品中 (McAdam 1996: 27; Marks and McAdam 1999: 99)，他也開始列舉其主要的面向，包括(1)政治體制的開放性與封閉性；(2)菁英體制的穩定性；(3)菁英聯盟者的存在與否；(4)國家鎮壓的能力與傾向。十分類似地，Tarrow 也認為政治機會結構主要包含下列的核心：(1')政治管道的存在；(2')不穩定的政治聯盟；(3')有影響力的盟友；(4')菁英的分裂 (見第五節)。比較這兩份名單可以得知，重疊性很高，大致上是屬於基本的共識範圍。在此，有若干面向值得討論。首先，McAdam 的(1)開放性與封閉性其實是涉及了整個政治機會結構的總合結果，而不是要素之一。因此，比較合適的說法是 Tarrow 的(1')政治管道。其次，兩人的(2)(3)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部分。至於 Tarrow 所提到的(4')菁英分裂，筆者則是認為與(2')(3')其實具有邏輯意涵關係，嚴格來說並不是獨立的。因此，總結上述的討論，政治機會結構的核心組成元素應該包括如下：

- (1'') 政治管道的存在。
- (2'') 菁英體制的穩定性。
- (3'') 政治聯盟者的存在。
- (4'') 國家鎮壓能力與傾向。

在此，筆者認為這份名單具有參考價值，因為這是概念性的整理，而不是經驗上的變項列舉。在經驗層次上，永遠無法列出所有可能的政治機會變項。而且即使這一份完整的變項名單是可能的，對於實際研究的助益也不大，因為並非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同時涉及所有的政治機會結構諸面向。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1) 曾指出，學者無法妥善地定義政治機會結構。如果定義的太廣泛，這個概念就顯得毫無意義、同義反覆；反之，如果採取太狹義的定義，那麼就很難解釋任何一個社會運動的興起。事實上，Goodwin and Jasper 所指出的兩難情境是不存在的。筆者認為，認真地對待國家中心論的核心預設，並且小心地釐清政治機會與運動資源的差異，就可以避免太廣泛而漫無邊際的概念使用。此外，原本就沒有必要詳列所有的政治機會結構變項清單，所以另一種太狹義的定義是不太可能面臨的危險。誠如 Meyer (2004: 134) 所指出的，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應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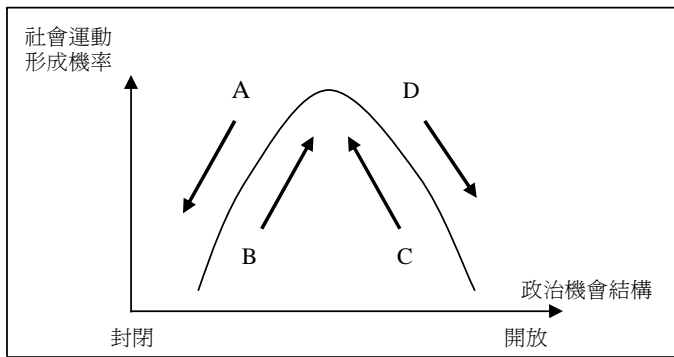
提出更廣泛的概念性思考，而不是任意地只舉與個案有關的變項。因此，國家中心論即是提供了政治機會結構研究者概念性思考的基礎。

刪除：指

套用一句理性選擇學派常用的語言，國家中心論的預設是「方法論的，而不是形上學的」。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者願意承認社會運動的多種風貌，涉及不同類型的議題、參與方式、價值理念，但是這並不否定國家權力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社會運動的目標有可能是追求某一種的自主性文化，反對政府的規訓與常態化，但是運動的成敗仍是受制於更廣大的政治氣候所影響。就這一點而言，國家中心論提供了設定研究議程、聚焦研究問題的作用，換言之，即是一套共同的分析語言，而不是預設了實際的結論。

### 三、開放性與封閉性

從一開始，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就是圍繞在開放性與封閉性問題。在此，開放性是指政治體制容許集體利益追求的範圍與程度。Eisinger (1973) 宣稱只有在開放性中等的政治機會結構下，社會運動才會產生，而過於開放或封閉的體制都是不利於社會運動。另一方面，Tarrow (1989a) 與 McAdam (1982) 則是認為社會運動的抗議週期是始於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而結束於其封閉。初看之下，兩種宣稱似乎存在不一致之處，需要進一步地說明。



圖一 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形成的機率

圖一是將 Eisinger (1973) 的曲線理論圖像化，根據他的說法，只有當政治機會結構產生 B 或 C 方向的變動時，社會運動才有存在的空間。

刪除：

A 方向的變動會使得社會運動的動員成本太高，而無法進行，相對地，D 方向的變動則將所代表的社會利益重新吸收進入體制內，也同樣使得社會運動消失。很明顯地，大部分的抗議週期研究者都是處理 A 與 B 方向的變動，因此，他們宣稱政治機會結構的開啓引發抗議風潮，而其收縮則是使得抗議衰退。用圖一的方式來表達 Tarrow (1989a) 與 McAdam (1982)，六〇年代義大利新左派運動與 1961-1965 年間的美國民權運動是處於 B 趨勢，而七〇年代的義大利與 1966-1970 年間的美國是處於 A 趨勢。同樣地，在研究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抗議之作品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Kubik 1998; Ekiert and Kubik 1999; Pérez-Díaz 1993; Hipsher 1998a, 1998b; Oxhorn 1991, 1994, 2001; 張茂桂等 1992)，學者也經常運用圖一的 A 與 B 趨勢來解釋抗議風潮的興衰。儘管並非所有的政治轉型研究者都使用政治機會結構這個術語，但是他們通常認為，(1) 政治高壓的鬆綁或說是自由化 (即 B 趨勢)，促成了抗議政治的浮現，刺激更多的社會運動出現；(2) 政治民主化的建立或說是民主鞏固 (即 A 趨勢)，使得抗議動員的幅度減少，社會運動呈現衰退的狀態<sup>10</sup>。

對於 Eisinger 所指認的曲線理論之另一半邊 (即 C 與 D 趨勢)，研究者的注意力似乎比較少。先就 D 趨勢而言 (即政治機會結構從半開放轉變為完全開放)，所造成的效果即是將社會運動吸收進入體制，成為 Tilly 所謂的「政體成員」。Gamson (1975: 29) 曾指出四種社會運動有可能的後果，即完全回應 (抗議團體獲得了承認與利益)、先發制人 (preemption) (抗議團體只獲得利益，但是缺乏承認)、收編 (co-optation) (抗議團體只獲得了承認，但是缺乏利益)、與瓦解 (抗議團體沒有獲得承認與利益)。從上述的分析來看，所謂的完全回應、先發制人與收編都可以算是 D 趨勢的表現，相對地，在瓦解的結局中，A 趨勢顯然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進一步而言，D 趨勢將使得社運組織朝向更體制化的方向轉化，通常是成為利益遊說團體或是政黨。從社會運動轉向為利益遊說團體的例子包括了七〇年代的美國主流環境保育團體 (Dunlap and Mertig 1992)、八〇年代的美國反核武運動 (Meyer 1993)。另一方面，形成政黨也可能是 D 趨勢的另一種結果，例子包括了八〇年代興起的巴西工人黨 (Keck 1986-7)、歐洲新左派政黨 (Kitschelt 1989; Redding and Vitterna 1999)、義大利的民粹主義政黨 (Diani 1996)。

<sup>10</sup> 關於政體轉型過程中的社會運動研究之批判與檢討，見何明修(2003)。

至於 C 趨勢（即從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轉變為半開放的），通常是符合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的出現條件。根據 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 1638-1639)的分析，反制運動通常是出現於若干群體的利益面臨威脅，但是又仍未完全喪失既有的優勢之時刻。用圖一的方式來表示，也就是 C 方向的變動。Useem and Zald (1982)所分析的美國核電利益集團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面臨國內反核聲浪的提高，美國核電業者開始受到政策轉向的壓力，除了一方面持續進行政治遊說以外，業者也開始動員核電工人與附近居民，共同以集體行動的方式來維護核電利益。

#### 四、從決定論到互動論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6-41) 提出另一項批判，亦即是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採取了過度客觀主義的預設，甚至形成了某種隱藏的結構決定論。Rootes (1997) 也提出類似的批評，在他看來，政治機會結構一詞容易排除偶發性的政治事件，而過度預設政治條件的一貫性。Gamson and Meyer (1996: 283) 更進一步強調，任何機會的存在是涉及了當事者的詮釋過程，因此，「沒有被察覺的機會根本不是機會」。從這些批判的標準來看，早期的研究作品的確是存在決定論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Skocpol (1979) 與 Kitschelt (1986)。同樣地，在一份研究台灣環境運動起源的作品中，學者指出，外在政治因素不足以解釋八〇年代的自力救濟風潮，因為「外部控制力鬆動或不見了，社會內部的力量也不見得會自發地萌生」（李丁讚、林文源 2000: 141）。在此的問題即是，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是否有可能避免這一類的危險，而不需要完全拋棄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

刪除：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在常態的情況下，政治機會的總合是呈現相對地穩定狀態，不同的政治條件彼此是相互關連，並且形成一個具有內部結構的整體。在最低限度之內，國家組織內部維持相當的一致性，而不太可能是存在劇烈的不協調。誠如 Tilly (1978: 191) 所指出的，「多重主權」(multiple sovereignty) 是革命局勢的特徵，而不是屬於平常狀態。因此，在既定的條件之下，社會運動所面臨的政治機會結構是呈現相對一致的，可以總括地使用開放性或封閉性來加以描述。儘管如此，要回應結構決定論的批判聲音，下列的思考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區分長期結構趨勢與短期事件的影響。Goodwin and Jasper (1999)、Rootes (1997)、Gamson and Meyer (1996) 都建議對於短期



事件的關注。事實上，並不是所有政治機會結構學者都排斥對於偶發性事件的討論。就以 McAdam (1982: 185, 200) 為例，他特別注意到 1968 年 Martin Luther King 暗殺事件所造成運動派系傾軋惡化與政府鎮壓強化。儘管如此，McAdam (1982)、Tarrow (1989a) 的研究企圖都是要建立一種抗議的週期性變遷模型，直接反映了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與收縮。在他們的作品中，個別事件只是長期趨勢中的代表性指標，其本身並不具有獨立的因果作用力。

Sewell (1994, 1996) 有可能是集體行動研究領域中對於時間議題最敏銳的學者，他很早就批判 Tilly 的「目的論時間觀」(teleological temporality) 與 Skocpol 的「實驗性時間觀」(experimental temporality)，都是企圖複製自然科學的律則觀。Sewell 提倡一種更以事件為中心的時間觀，重視若干重大的歷史事件之特殊影響力。到了晚近，這種事件時間觀點更進而影響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學者開始探討所謂的「轉化性事件」(transformative event) 對於政治機會結構的衝擊 (McAdam and Sewell 2001: 101-112)。轉化性事件即是運動過程中的轉捩點，透過群眾抗爭所帶來的擾亂與不確定性，舊有的政治環境被強力扭轉過來，新社會的圖像就是預先展示在這個時刻之中。另一方面，學者也重新詮釋了所謂的「突如其來的民怨」(suddenly imposed grievance) (Walsh 1981)，並且將這個概念重新帶入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在他們看來，這些偶發性的事件經常具有重新形塑政治環境的作用力，並且驅動新一波的抗爭動力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201-204)。因此，政治機會結構並不一定必然排斥短期事件的討論，越是在晚近作品中，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平衡以往長期性或週期性的分析取向，轉而更注意偶發性的、未預期性的政治機會面向。

第二，掌握機會與製造機會。在以往，學者為了強調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經常將政治機會結構當成具有因果解釋效力的自變項，社會運動的形成、成敗、策略取向等因素則是被解釋的依變項。Kischelt (1986) 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其分析中，歐洲反核運動的策略與影響程度完全是受限於既有的政治機會結構。如此一來，彷彿社會運動只能夠消極地等待時運，至多只能在關鍵時刻掌握機會，而缺乏主動性的製造或改變機會的能力。因此，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很容易就被認為是「政治決定論」、「政治化約論」，而忽略了社運部門的自主性 (張茂桂 1994: 46-47)。

刪除：

越到了晚近，學者也開始強調另一個面向，亦即是社會運動如何製



造機會 (Tarrow 1994: 96-99; McAdam 1996: 35-37)。更進一步來說，製造機會的方式存在下列的多種可能：首先，社運組織有可能故意誘使對手犯錯，喚起第三者的關心，使得原本不利的局勢獲得扭轉。McAdam (1983: 749) 就指出，民權團體特意選定在南方白人警察最殘暴統治的城市發動抗爭，以促使聯邦政府推動民權法案。其次，菁英分裂雖然常被認為是有利於社會運動的出現，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菁英之間的不協調與意見對立也有可能是運動的後果。舉例而言，Jenkins and Brents (1989) 指出，美國三〇年代的工人抗爭迫使資本家陣營分裂，出現一派改革取向的企業家，有助於 1935 年社會安全法案通過。同樣地，Piven and Cloward (1977: 60-64) 強調，三〇年代的失業工人抗議使得地方官員面臨極大的挑戰，轉而向聯邦政府施壓，要求更多的社會救濟措施。最後，成功的社會運動展現了對手的弱點，其本身就是形塑政治機會結構的原因之一。就其直接的影響而言，先行的社會運動將會降低後續的動員成本，使得統治者更難以採取壓制的手段。在探討台灣八〇年代社會抗議的作品中，研究者即發現這種「掩護效果」或「擴散作用」(吳介民 1989: 102-103; 何明修 2003a)。在台灣教育改革的研究方面，學者也發現反對團體可以巧妙地運用國家結構內部的矛盾，運用民意代表的力量來形成所謂的「政治槓桿」，迫使官僚體制接受其改革訴求(熊瑞梅、紀金山 2002: 230-231)。

刪除：：

刪除：：

另一方面，就其間接的影響而言，先前的社運也有可能在不意圖的情況下產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為後來的社運開拓新的機會。舉例而言，七〇年代美國婦女運動者成功地打入政府部門，也為八〇年代新興的反核武運動提供了不少協助(Meyer and Whittier 1994: 292)。因此，政治機會結構不應被視為不可改變的前提，在若干條件的配合下，社會運動有可能成功地塑造機會，而不只是被動地反映或等待機會。

第三，從普遍律則到因果機制。另一個困擾的問題在於，許多研究者期待或是被期待要找出某種的普遍性宣稱，明白地指出某個政治機會將會帶來何種程度的作用。Skocpol (1979) 顯然是遵循這套方法論的原則，她試圖證明：革命局勢只有在產生於進行現代化過程中的農業官僚帝國。然而，在政治機會結構的批判者看來，這種普遍律則的企圖通常是徒勞無功的。舉例而言，選舉的舉行到底是增加了抗爭者的運作籌碼，還是產生了抑制體制外行動的壓力？在這一點，政治機會的作用方向是不確定的。另一方面，批判者更指出，若干的抗議活動並不是政治機會結構的開啓所

導致，反而是由於威脅與危險，才引發參與者的熱情（Jasper 1997: 37-38）。<sup>11</sup>

晚近以來，幾位主要的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拒絕這種普遍律則的思考方式。他們強調，集體行動的研究應該放置在於互動層次的分析，從不同的個案中尋找中間層次的因果機制，而不是某一種涵蓋式的命題（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24-27, 46-47）。從這個觀點來看，某項政治條件之所以發揮作用，並不是由於它符合了某種因果律則，而是透過了一種涉及抗議者與被抗議者互動的機制。在解釋特定的運動過程時，研究者的任務應是在於分析其中的結構歸屬（attribution）與行動者佔用（appropriation）之互動，而不是假定某一種政治因素是具有一致性的作用力方向。因此，光是指出某一種政治條件是有益抗爭出現是不充份的，研究者仍需要進一步指認出其影響的途徑與管道，亦即其因果作用的機制。

更進一步來說，一旦我們拒絕了決定論式的普遍律則，那麼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到底如何促成抗議產生，則是需加以說明的過程，而不是某種假定的自然反應。事實上，開放的政治機會可以帶來某種的參與管道，同時也是排除了某一種的社運動員可能性。在美國八〇年代的核彈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中，Meyer（1990: 246）指出，美國政黨政治的可穿透性使得某些反核彈運動者被吸納進入在野的民主黨陣營，導致整體運動部門的去動員化。吳介民（2002）認為，台灣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之一，也是由於以往民進黨人士的高度介入。從反核運動的歷程中，政治菁英的支持也有可能造成運動部門的資源依賴（何明修 2003b; Ho 2003）。因此，一旦拒絕了決定論式的思考模式，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需要進入更為中程層次（middle-range）的機制討論，仔細地區辨出每一項政治機會所帶來各種可能作用。

刪除：辦

總而言之，一個更可行的分析策略在於重視短期突發事件、政治機會的製造、因果機制的解釋。粗糙的決定論預設開始受到質疑，一種新的

<sup>11</sup> 在其他文章，Goodwin and Jasper(1999: 39)更誇張地說，由於威脅(threat)能夠發揮強大的動員效果，因此可以說在某些個案中，正是由於政治機會結構封閉，社會運動才產生。在此，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缺乏意義的，因為威脅是強化了參與者的參與意願，用 Snow and Benford(1988: 202)的話來說，即一種「動機框架」(motivational frame)，但是並非指涉任何政治條件的改變。簡單地說，Jasper 等人在此的批評是混淆了心理的與政治的層面。

互動論分析成爲新的主流意見。在九〇年後期以來，這些修正觀點逐漸成爲主要學者的共識。

## 五、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可以處理那些議題

在一開始，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發現是爲了解釋某種社會運動的出現，創造這個概念的 Eisinger 即是爲了分析爲何美國種族抗議在某些都市產生，而不是其他地區。隨著這個概念的通行，更多的研究則是擴展了其解釋效力，並且用於處理不同的社會運動研究議題。這一小節將要簡單地回顧這些研究議題，並且指出未來的發展可能。

1. 社會運動的動態：這一類的問題包括了運動的起源、發展與衰退。如果說資源動員論將社會運動的動態視爲資源供給的函數，相對地，那麼政治機會結構的歷史變遷則是提供了另一種的考察視野。在此，Tarrow (1989b) 的理論化是最爲完備的。他將抗議週期與政治機會結構的關係概念化，並且提出一套完備的解釋模式。事實上，大部分政治機會結構研究都是重視這個研究議題，本節的第三小節所提到的文獻幾乎都可以歸屬此類。
2. 社會運動的政策影響：在 Kitschelt (1986)、Kriesi et al. (1995) 的跨國比較研究中，他們都注意到這一點，政治機會結構不只是影響了動員的幅度與規模，同時也對於社會運動的政策後果產生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晚近，使用政治機會結構來解釋政策作用的作品可以參考 Amenta 等人所謂的政治中介模型 (political mediation model) (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Amenta, Halfmann and Young 1999; Amenta and Young 1999)。在 Amenta 等人看來，社會動員的變項不能直接預測後果，而是要與諸多政治條件相互作用，才發揮其影響力。
3. 社會運動的策略：既然政治機會結構是一組影響動員成本的政治條件總合，那麼社運策略擬訂自然是與其密切相關的。因此，Tilly 關於抗議劇碼演進的探討可以視爲是反映了政治機會結構的長期變遷。Kitschelt (1986) 指出，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性與否導致了同化性與對抗性策略的採用。McAdam (1982)、Meyer (1990)、Tarrow (1989a) 的研究都指出，隨著抗爭週期的結束，不利的政治機會結構迫使運動組織面臨溫和化、進入體制或是激進化與邊緣

刪除: 劫

格式化: 項目符號及編號

刪除: 企

刪除: 勃

刪除: 狂

化的策略困境。在歐洲左派恐怖主義運動研究中，Della Porta (1995: 55-82) 也將激進化視為社會抗議與抗議處理 (policing of the protest) 之策略性互動後果。她強調，抗議處理是政治機會結構的晴雨表 (barometer)，因此，也影響了抗議份子的策略選擇。

刪除: d

4. 社會運動的構框：所謂的集體行動框架 (collective action frame) 是一套詮釋意義的方式，使得個體願意接受社運組織所宣傳的世界觀，並且鼓勵與正當化運動的參與。因此，構框 (framing) 則是指涉建集體行動框架的集體努力。McAdam (1982) 所謂認知解放的概念即是一種將政治機會結構與參與者心理狀態連結的嘗試。到了八〇年代中期以來，Snow 等人所提出的框架、構框理論則是被普遍接受，McAdam 本人也越來越採取策略性構框的說法，而比較少採用認知解放的概念。因此，晚近以來的討論主要是將策略性構框與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連結在一起，不少研究者指出，框架越能符合政治機會結構，就越能發展動員的作用 (Cornfield and Fletcher 1998; Diani 1996; Reese 1996; Schneider 1997)。另一方面，Snow and Benford (1992: 143-150) 依據抗爭週期的理論，提出了所謂主導框架 (master frame) 的說法。主導框架是構成同時期各種社會運動的共同訴求或想法，例如美國六〇年代的民權訴求可以在種族、女性、學生運動中看到。Snow 與 Benford 認為，抗爭週期的開啓是伴隨著新的主導框架之出現，一旦主導框架喪失了原有的說服力，抗爭的幅度也就跟著降低。根據王甫昌 (1996) 的研究，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在七〇年代末期與八〇年代末期分別出現了兩波動員的高峰，兩次的挑戰是針對不同的主導框架，亦即是民主化與本土化。儘管如此，學者對於主導框架的研究興趣仍不如策略性構框，這也是未來政治機會結構研究者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刪除: 玃

刪除:

刪除:

5. 微觀動員的諸要素：所謂微觀動員 (micromobilization) 是指社會運動參與中的互動與溝通過程 (Snow, Rochford, Worden and Benford 1986: 464)。晚近以來，微觀動員的研究者提出不少的概念，例如認同、框架設定 (frame alignment)、共識動員、傳記上的可及性 (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 等。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機會結構學者並沒有將他們的探討焦點放置在這些問題。舉例而言，在 McAdam 等人一系列探討運動參與的微觀研究中，政治機會結構是沒有運用上的概念工具 (McAdam 1988, 1989; McAdam and Paulsen 1993; Wiltfang and McAdam 1991)。在此，范雲 (2003: 152) 對於

刪除: 玃

台灣婦女運動的發現是十分有意義的。她指出，1994年前後參與的婦女運動者在年齡、階級、省籍的傳記背景呈現明顯不同，也因此構成了兩波婦女運動的不同策略取向。這個發現啟發了一個可能性，政治機會結構是透過參與者的傳記背景，從而影響了社運的策略。也因此，我們可以期待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可以進一步用來討論微觀動員的諸因素。

綜合以上的說明，傳統上研究者使用政治機會結構來解釋社會運動的動態、政策作用、策略、策略性構框，但是對於主導框架、微觀動員的議題則是較少處理。對於若干議題較少著墨，批評者很可能會認為這是由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本身的缺陷。相對地，筆者則是認為這些議題反而值得進一步探討，一旦能夠累積更多的經驗研究，將能夠更豐富化我們對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理解。

刪除：是

## 柒、結論：政治機會結構與「小思考的策略」

在一份經典性的研究作品中，Gamson (1975: 38-54) 比較不同社會運動的策略運用。他發現單一議題的社運組織較有可能獲得成功，而追求廣大目標、多重議題的社會運動往往很難有所斬獲。Gamson 將這種贏的祕訣稱為「小思考的策略」(strategy of thinking small)。同樣地，關於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筆者認為其所面臨的困境並不是來自於國家中心論的基本預設，相反地，正是由於這些基本預設沒有被釐清，才導致了諸多的誤解與誤用。因此，要解決理論的困境，關鍵並不一定在於放棄原先的預設。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而言，「小思考的策略」也是有啟發性的，因為一個好的理論並不一定要能夠處理所有的問題，而是特定的脈絡中能夠發揮該有的分析作用。政治機會結構的優點在於能夠更精緻地處理社會運動與國家部門的關係，使得政治面向的議題能夠獲得重視。但是除此之外，這套觀點並沒有預設某種社會運動的單一本質，也沒有否認各種社會運動的多樣性。作為一種經驗分析的工具，它不需要去定義社會運動的本質或其意義，也因此，種種的反制運動也可以被納入其分析的對象。

在本文中，筆者回顧了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發展歷程，整理這種分析觀點如何從不同的領域中逐漸匯流而成。最晚到了八〇年代，一個主流的共識開始成形，其中包括了：1、政治體制是有選擇性的開放，導致若干集體利益的追求必得要採取抗議的形式；2、國家是當代政治生活的中

心，社會運動所抗爭的焦點是涉及國家權力的實行與不實行；3、即使是所謂的新社會運動也是處於舊政治的脈絡中，政黨、民主、國家組織等因素同樣地具有影響力；4、資源與機會需要在概念上更進一步釐清，前者泛指能夠協助社運動員、而能夠被社運組織所擁有的因素，而後者則是特指政體的開放性程度。基於這些觀點，政治機會結構的理論儼然成形，並且成爲一種十分具有潛力的分析途徑。

然而到了九〇年代，一方面由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濫用，另一方面由於其他學者的質疑，這一類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挑戰。針對這一點，本文的第二個意圖即是重新釐清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內容與適用範圍。綜合上述的整理，筆者提出下列的建議：1、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涉及了互動關係與國家權力的問題，因此，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也有其政治過程；2、政治機會結構強調一種國家中心論的預設，如此可以有助於分辨資源與機會之差異；3、要避免政治機會一詞的浮濫使用，重點並不是在於列舉所有可能被稱爲機會的清單，而是更重視國家中心論的基本立場；4、開放性與封閉性是相對說法，Eisinger 所指認出的曲線關係之另一半（即從半開放性到完全開放性）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討；5、研究者應該放棄決定論的立場，改採互動論的觀點，並且更注重短期事件、機會製造與中層因果機制的分析。總之，筆者相信，釐清這些關鍵性的議題，能夠將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放置於更穩固的方法論基礎上。

## 參考文獻

-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政治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八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129-210。
- 王甫昌，1999，〈社會運動〉。頁 501-536，收錄於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何明修，2002，〈為何民進黨政府的廢核政策失敗？社會動員、改革機會與政治策略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6：86-137。
- 何明修，2003a，〈民間社會與民主轉型：環境運動在台灣的興起與持續〉。頁 29-68，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台北：新自然主義。
- 何明修，2003b，〈自主與依賴：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台灣社會學刊》30：1-49。
- 吳介民，1989，《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 1980 年代》。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159-198。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19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133-206。
-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台灣社會學》5：133-194。
- 張茂桂，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北：國策中心。
- 張茂桂，1994，〈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志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33-66。
- 張茂桂等，1992，《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自力救濟」事件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 熊瑞梅、紀金山，2002，〈「師資培育法」形成的政策範疇影響力機制〉。《台灣社會學》4：199-246。
- Amenta, Edwin and Michael P. Young, 1999, "Making an Impact: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llective Goods Criterion." Pp.



- 22-41, in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ed. by Marco Giugni et al.,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menta, Edwin, Bruce G. Carruthers, and Yvonne Zylan, 1992, "A Hero for the Aged? The Townsend Movement, the Political Mediation Model, and U.S. Old-Age Policy, 1934-195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308-339.
- Amenta, Edwin, Drew Halfman, and Michael P. Young, 1999, "The Strategies and Context of Social Protest: Political Medi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Townsend Movement in California." *Mobilization* 4: 1-23.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S.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947-952.
- Brockett, Charles, 1991,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253-274.
- Calhoun, Craig, 1993,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 385-427.
- Cohen, Jean L. and Andrew Arato 199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hen, Jean, L., 1982, "Between Crisis Management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Plac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elos* 52: 21-40.
- Cohen, Jean, L., 1983,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28: 97-113.
- Cohen, Jean, L.,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663-716.
- Connolly, William, 1983,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Oxford: M. Robertson.
- Cornfield, Daniel and Bill Fletcher, 1998,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Social Movement 'Frame Extension': Shifts in the Legislative Agenda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881-1955." *Social Forces* 76: 1305-1321.
- Dalton, Russell J., 1994,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 Western Europ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 J., 1995, "Strategies of Partisan Influence: West European Environmental Groups." Pp.296-323, in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edited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Della Porta, Dontella,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ni, Mario, 1996, "Linking Mobilization Frames to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sight from Regional Populism in Ita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053-1069.
- Dunlap, Riley E. and Angela G. Mertig, 1992,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from 1970 to 1990: An Overview." Pp.1-10,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edited by Riley E. Dunlap and Angela G. Mertig. Philadelphia: Taylor& Francis.
- Eisinger, Peter K., 1971, "Protest Behavio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Pol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33: 980-1007.
- Eisinger, Peter K.,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1-28.
- Eisinger, Peter K., 1974, "Racial Difference in Protes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592-606.
- Ekiert, Grzegorz and Jan Kubik, 1999, "Protest Event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oland, 1989-1993." Pp. 317-348, in *Acts of Dissent*, edited by Dieter Rucht et al..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 Ferree, Myra Marx and Silke Roth, 1998, "Gender, Clas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 Strike of West Berlin Day Care Workers." *Gender and Society* 12: 626-648.
- [Freeman, Jo, 1979,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trategy: A Model for Analyzi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Actions." Pp. 197-189,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Cambridge, MA: Winthrop.](#)
- Foweraker, Joe, 1997,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 Collective Action.” Pp.64-77,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ollective Action*, edited by Ricca Edmondson. London: Routledge.
- Gamson, William A. and David S. Meyer,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Pp.275-29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Oxford: Polity Press.
- Goldstone, Jack, 1980, “Theories of Revolution: The Third Generation.” *World Politics* 32: 425-453.
- Goodwin, Jeff and James M. Jasper, 1999, “Caught in a Winding, Snarling Vine: 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 27-55.
- Hipsher, Patricia L., 1998a,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 Outcomes: The Chilean Shantytown Dwellers’ Mo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149-168, in *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 edited by Marco G. Giugni et al..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 Hipsher, Patricia L., 1998b,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s Protest Cycle: 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in Democratizing Latin America.” Pp.153-172, 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edited by David S.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 Ho, Ming-sho, 2003, “The Politics of Anti-Nuclear Protest in Taiwan: A Case of Party-Dependent Movement (1980-2000).”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683-708.
- Hunt, Lynn, 1984, “Charles Tilly’s Collective Action,” Pp.244-275,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sper, James, M.,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刪除: Goldstone, Jack A. and Charles Tilly, 2001, “Threat (and Opportunity): Popular Action and State Response in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us Action.” Pp. 179-194,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ited by Ronald A.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Craig J. and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 Movement (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249-268.
- Jenkins, J. Craig and Barbara G. Brents, 1989, "Social Protest,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ocial Reform: A Political Strugg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891-909.
- Jenkins, J. Craig and Craig M. Eckert, 1986, "Channeling Black Insurgency: Elite Patronage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ack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812-829.
- Jenson, Jane, 1995, "What is in a Name? Nationalist Movements and Public Discourse," Pp. 107-126,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edited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eck, Margaret, 1986-7, "Democratization and Dissens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Politics and Society* 15: 67-95.
- Kitschelt, Herbert,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57-85.
- Kitschelt, Herbert, 1989, *The Logic of Party Form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itschelt, Herbert, 1991,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 Critique." Pp. 323-347,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edited by Dieter Ruc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landermans, Bert P., 1990, "Linking the 'Old' and the 'New': Movement Networks in the Netherlands." Pp. 122-137, in *Challenging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ited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Koopmans, Ruud, 1995, *Democracy from Below: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West German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oopmans, Ruud, 1999,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Some Splitting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 93-106.
- Kriesi, Hanspeter et al.,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ubik, Jan, 1998,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d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Central Europe." Pp. 131-152 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edited by David S.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 Lipsky, Michael, 1968, "Protest as Political Resou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144-1158.
- Maguire, Diarmuid, 1995, "Opposition Movement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Equal Partners or Dependent Relations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Reform." Pp. 199-228, in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edited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Mainwaring, Scott and Eduardo Viola, 1984, "New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Brazil and Argentina in the 1980s." *Telos* 61: 17-52.
- Marks, Gary and Doug McAdam, 1999,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o the Form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97-111,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edited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et al.. London: Macmillan.
- Marx, Gary T. and Douglas McAdam, 1994,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cess and Struc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Mayer, Margit, 1991,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nd Social Movement Practice: The U.S. Pattern," Pp.47-120,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ieter Ruc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McAdam, Doug and Ronnelle Paulsen,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640-667.
- McAdam, Doug and William H. [Sewell](#), 2001, "It's about Time: Temporarity

刪除: Sewell

- in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Pp. 89-125, in *Silence and Voices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ited by Ronald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and Sidney Tarrow, 2000, “Nonviolence as Contentious Interacti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3: 149-154.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1983,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735-754.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996, “Introduction: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Framing Process: 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p. 1-2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1996, “To Map Content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 1: 17-34.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1997, “Toward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Pp. 143-173,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dited by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mmon, Holly J. et al., 2001, “How Movements Win: Gendered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U. S.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s, 1866 to 191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49-70.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87a, “Appendix: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p.337-392,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87b,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Pp.15-42,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McCarthy, John D., 1987, “Pro-Life and Pro-Choice Mo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Deficits and New Technologies.” Pp. 49-66,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Melucci, Alberto, 1994, “A Strange Kind of Newness: What’s ‘New’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Pp. 101-130,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Enrique Laraña et al..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David S. and Nancy Whittier, 1994, “Social Movement Spillover.” *Social Problems* 41: 277-298.
- Meyer, David S. and Suzanne Staggenborg, 1996, “Movements, Countermove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628-1660.
- Meyer, David S., 1990, *A Winter of Discontent*. New York: Praeger.
- Meyer, David S., 1993, “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 T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the End of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8: 157-179.
- Meyer, David S.,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125-145.
- Noonan, Rita K., 1995, “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ological Forum* 10: 81-111.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xhorn, Philip, 1991, “The Popular Sector Response to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hantytown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Military Coup.”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8: 66-91.
- Oxhorn, Philip, 1994, “Where Did All the Protesters Go? Popular



- Mobil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Chil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1: 49-68.
- Oxhorn, Philip, 2001, “From Human Rights to Citizenship?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6: 136-182.
- Pérez-Díaz, Víctor M., 1993,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ow, Charles, 1979, “The Sixties Observed.” Pp. 192-211,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Cambridge, MA: Winthrop.
- Perry, Elizabeth, 2001,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Popular Protest in Moder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3: 163-180.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Cloward,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Cloward, 1992, “Normalizing Collective Protest.” Pp.301-325, in *Frontiers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Quadagno, Jill, 1992, “Social Movements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Labor Unions and Racial Conflict in the War On Pover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616-634.
- Redding, Kent and Jocelyn S. Vitterna, 1999, “Political Demand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Explaining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Left-Libertarian Parties.” *Social Forces* 78: 491-510.
- Reese, Ellen, 1996, “Materna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How California’s Postwar Child Care Campaign Was Won,” *Gender and Society* 10: 566-589.
- Rochon, Thomas R., 1990, “The West European Peace Movement and the Theory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Pp. 105-121, in *Challenging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ited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Rootes, Chris, 1997, "Shaping Collective Action: Structure, Contingency and Knowledge." Pp. 81-104,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ollective Action*, edited by Ricca Edmondson. London: Routledge.
- Rucht, David, 1990, "The Strategies and Action Repertoires of New Movements," Pp.156-175,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edited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Schattschneider, E. E.,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Schneider, Cathy, 1997, "Framing Puerto Rican Identity: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Neighborhood Organizing in New York City." *Mobilization 2*: 227-245.
- Sewell, William H., 1994,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Pp.169-198, in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well, William H.,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Pp.245-280, in *The Historical Turn of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in Current Research," Pp. 3-37,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s. by Peter Evans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Pp.197-218,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ed. by Bert Klandermans et al..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2, "Maser Frame and Cycles of Protest." Pp.133-155,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s. by

-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81.
- Tarrow, Sidney, 1988,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421-440.
- Tarrow, Sidney, 1989a,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arrow, Sidney, 1989b, *Struggles, Politics and Reform: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ycles of Protest*. Western Societ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No. 2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 Tarrow, Sidney, 1994,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rrow, Sidney, 1996a,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 Pp. 41-61,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oug McAdam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rrow, Sidney, 1996b, "Social Movement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A Review Artic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874-883.
- Tilly, Charles et al.,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5a,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Pp.3-83, in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5b,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Pp.380-455, in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刪除: Tarrow, Sidney, 1999, "Paradigm Warrior: Regress and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Sociological Forum* 14: 71-8.

- Tilly, Charles, 1981,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illy, Charles,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297-317,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illy, Charles,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Pp. 169-191,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s. by Peter Evans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Tilly, Charles, 1997,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Theory and Society* 26: 245-273.
- Tilly, Charles, 1998, "Political Identities." Pp.3-16 in *Challenging Authority*, edited by Michael Hanagan et al..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88, *Return of the Acto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Useem, Bert and Mayer N. Zald, 1982, "From Pressure Group to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Dilemma of the Effort to Promote Nuclear Power." *Social Problems* 30: 144-156.
- Wald, Kenneth et al., 1996, "The Politics of Gay Right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Explaining Anti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and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1152-1178.
- Walsh, Edward J., 1981,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Citizen Protest in Communities around Three Mile Island." *Social Problems* 26: 1-21.
- Wilson, James Q., 1961, "The Strategy of Protest: Problems of Negro Civic 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 291-303.
- Wiltfang, Gregory and Doug McAdam, 1991, "The Costs and Risks of Social Activism: A Study of Sanctuary Movement Activism." *Social Forces* 69: 987-1010.
- Zald, Mayer N. and John D. McCarthy, 1975, "Organizational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ticism of Society.” *Social Service Review* 50: 344-362.

Zald, Mayer N., 1991, “The Continuing Vitalit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Pp. 348-354,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ieter Ruch,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